

六百年的文明對望

——從「紫禁城看世界」展覽看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

劉璟

六月的維多利亞港畔，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內，一場跨越六百年的文明對話徐徐展開。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的「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展覽，於六月三日正式啟幕。展覽以元、明、清三代歷史為縱軸，將紫禁城重新置於世界文明交流的廣闊坐標之中。這裏不只是帝王起居與禮制運作的宮城，也曾是來自亞洲、歐洲乃至更遠地區的物產、技藝、觀念與知識彼此會合的場域。展覽從一件件流轉於道路、海港與宮廷之間的文物出發，揭示中華文明在持續交流、吸收與創造中形成的深厚而開放的文化氣象。

此次展覽彙集故宮博物院、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一百三十多件珍品，涵蓋書畫、珠寶、鐘錶、瓷器、玻璃器、傢具和絲織物等多個門類。為了讓觀眾看到更多故宮珍藏，展品採取每三個月輪換的機制，每期展出八十餘件文物，使展覽本身成為一個不斷生長的文化有機體。這些文物並非簡單陳列的「異域奇珍」，而是中外相遇的歷史見證：一件器物的材質、造型、紋飾和製作技術，往往連接著商路的開拓、外交的往還、審美的轉化以及知識的傳播。透過這些器物的生命軌跡，紫禁城的歷史從宮牆內部延伸至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廣州口岸、西亞作坊和歐洲工廠。

值得注意的是，展覽並未把歷史講述停留在年代與器名的排列上，

而是將文物放回其產生、流轉和使用的關係網絡之中。香料、翠羽、瓷器、鐘錶等物品，一端連接宮廷禮儀與日常生活，另一端連接商船、使團、工匠和港口。觀眾由此能夠理解，所謂「世界進入紫禁城」，並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以可見、可感的物質形式發生在陳設、賞玩、服飾與知識實踐中的真實歷史。

展覽中，一件元末明初傳入中國的馬木路克王朝彩繪描金玻璃撇口雙耳瓶尤為醒目。它來自伊斯蘭世界，瓶身以金彩描繪《古蘭經》經文，其進入中國收藏體系的歷程，折射出歐亞貿易與藝術傳播的深遠聯繫。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明代青花瓷器對進口鈷料和西亞器形的大膽吸收與再造。中國工匠將來自波斯的蘇麻離青料融入本土製瓷技藝，創造出影響世界的青花藝術。由此可見，文明互鑒並非一方對另一方的被動接受，而是經由選擇、轉化和再創造，形成新的藝術高峰。

進入清代，中外交流在宮廷工藝與科學知識層面呈現出更加豐富的面貌。來自西方的繪畫技法、瑣瑣工藝、玻璃鏡和機械鐘錶進入宮廷生活，與中國傳統審美、製作體系和使用習慣相融合。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以歐洲寫實方法表現中國花鳥題材，其《花鳥圖》冊光影細膩、透視精準，卻處處滲透著東方審美的含蓄與雅緻。清乾隆金胎畫琺瑯西洋人物圖執壺，壺身開光內繪西洋人物，背景間以傳統山水花卉紋樣，西方面孔與

東方意境達成驚人的和諧。紫檀嵌瑯瑯西洋人物羅漢床，則讓西洋人物場景嵌入中式傢具的深沉靜穆之中，無聲宣告遠西之風已吹進紫禁城深處。這些藝術品表明，清宮對於外來文化的興趣，並非僅止於獵奇賞玩，而是將新技術、新圖像和新材料納入自身的文化表達之中。

鐘錶與機械玩具尤其生動地呈現了技術交流如何改變宮廷生活。十九世紀銅鍍金嵌洋瓷鳥音籠，上弦後籠中機械鳥振翅鳴啾，將歐洲精密製造與中國提籠賞鳥的生活趣味巧妙結合。銅鍍金壁鏡表兼具照容與報時功能，反映出西方器物在中國宮廷獲得了新的使用語境。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著粵海關成為對外貿易和貨物輸送的重要樞紐，廣州工匠逐漸掌握並轉化西洋鐘錶技藝，製作出兼具歐洲機械結構與中國裝飾風格的「廣鐘」。一件清銅鍍金轉花變字水法問樂鐘，轉動之間花朵旋轉、水法潺潺，報時之際樂聲悠揚，正是廣州鐘錶作坊將西洋原理與嶺南審美完美結合的產物。從輸入器物到在地創造，技術交流最終沉澱為中國工藝史上的嶄新成果。

展覽的視野還指向一種更加複雜的全球文化網絡。日本明治時期的鷲尾花紋提探壺，仿照歐洲銀茶具器型，壺身飾以優雅的鷲尾花紋，既體現日本工匠對西洋樣式的吸收與再造，又經由交流渠道進入中國宮廷收藏。它提示觀眾：茶葉從中國輸出海外，影響歐洲飲茶習慣；歐洲器用影



▲清乾隆，金胎畫琺瑯西洋人物圖執壺。故宮博物院藏。



▲馬木路克王朝（一二五〇年至一五一七）年，彩繪描金玻璃《古蘭經》撇口雙耳瓶。故宮博物院藏。

響日本工藝；而經日本重新創造的作品，又回到中國視野之中。文化從來不是沿着單方向傳播，而是在不斷往返、疊加與變形中生成新的意義。除了靜態文物，展覽還借助多媒體裝置讓歷史體驗鮮活起來。以乾隆花園倦勤齋「通景畫」為靈感的投影，將紫禁城幻化為萬國奇珍異獸匯聚的奇幻園圃，呼應各國使節攜珍禽異獸來朝的盛景。互動裝置「康熙帝學什麼」則邀請觀眾與「數碼康熙帝」一同學習天文、數學、地理等西學，生動還原那位勤勉帝王面向世界的開放胸襟。

從宮廷收藏到公共博物館，文物的意義也在發生新的轉換。昔日為帝王賞鑒、貢賜或陳設而存在的器物，今天成為公眾理解絲路交通、海洋貿易與文明互鑒的共同教材。它們讓歷史不再只是書本中的結論，而成為可以觀看、比較和討論的現實經驗。

今日重看紫禁城，重要的不只是欣賞皇家珍藏的精美，更是理解文

明發展的真實邏輯。開放並不意味著失去自身，交流也並不意味著取消差異。恰恰是在面對異域材料、技術和思想時，中國工匠與宮廷文化展現出吸納、轉化與創新的能力，使外來元素在中華文化語境中生發新的生命。「紫禁城看世界」不僅回望過去，也回應當下：不同文明唯有在平等交流與彼此欣賞中，才能不斷拓寬自身邊界。

香港作為聯通中外的重要城市，為這場展覽賦予了格外深長的現實意涵。在維港之濱，來自不同地域的歷史珍品再次相遇，六百年的文明交流化作今日觀眾可以凝視、感受和思考的文化現場。透過紫禁城這扇窗口，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中華文明兼收並蓄的胸襟，也看到人類文明因相互學習而愈加豐厚的共同未來。

七日談

（北京篇）

紅磚裏的火種

漫步中山大學光明校區



藝苑草 周蜜蜜

陽光漫過山脊時
你立在天地之間，以紅磚為骨
撐起一片向蒼穹伸展的屋檐

宏偉，不是冰冷的尺度
是每一寸牆體裏，都跳動著滾燙的名字
是圖書館深處那行被歲月擦亮的校訓
一筆一畫，都來自領袖的囑託與凝望

風穿過拱窗時，帶著百年的回響
那不是遠去的故事
是每一盞燈下，學子筆尖升起的星辰
正沿著領袖指明的路，匯入時代的江流

你托舉著一代代人的夢想
讓它們向著中華復興的方向生長
向著人類文明的曠野，奔赴創新的光芒
鐘聲會輕輕敲響，像一句永恆的叮嚀：

這裏的每一步，都連著來時路
這裏的每一顆心，都裝著中國夢
向著更遠的未來，更遼闊的晴朗
——生生不息，赤誠如初



雲海景觀 美如畫

六月六日，湖南省常寧市塔山瑤族鄉天堂山雨後出現雲海景觀（無人機照片）。



市井萬象

新華社



人與事 楊苗燕

「個人是十分渺小的，我在珠江邊長大，像珠江邊一粒沙，丟進江裏只能激起幾圈皺紋而已，一下子就恢復平靜了。」

這是叔叔楊奇晚年說過的一句話。

第一次聽到時，我並沒有太多感受，只覺得這是一種慣常的謙遜表達。很多老一代知識人，在談及自身時，往往會用類似的比喻，似乎都在強調個體在時代面前的有限性。但後來慢慢回想，才發現這句話其實並不只是謙虛，它更像是一種長期經歷風浪之後的自我認知。他不是在不認自己的存在，而是在強調一種分寸感：人在歷史面前，不必張揚，不必喧嘩，也不必試圖把自己放得過大。

後來見到晚年高齡的叔叔，與他談話、見他行事，這種分寸感便有了具象的輪廓。那些大時代裏跌宕起伏的驚心動魄，老人在回憶時只是淺淺笑著，用最素樸的語言回答，還不時提醒我：「不要有溢美之詞，平實一點好。」

可問題是，這樣一個自稱「一粒沙」、追求平實的人，卻在二十世紀中國南方新聞史中留下了極其不尋常的軌跡。從香港到廣州，從戰時到和平時期，從游擊區的簡陋報紙，到城市報業的成形，他幾乎貫穿了整個嶺南報業的關鍵階段。

但如果只從這些歷史「軌跡」去理解他，其實仍然不夠。因為在我記憶裏，叔叔首先不是一個「報人」，也不是一個「社長」，而是一個始終溫厚的人。

這種溫厚，並不是後來形成的修養，而像是一種更早就存在的性格底色。甚至可以說，在他十一歲的時候，這種底色已經顯現出來。

二

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旋風橫掃香港，驚濤駭浪捲走了一位來自廣東中山的布匹小商人楊紹彬「永發」的夢想，他白手起家在中環永安街開設的「永發布匹店」倒閉了。隨之大受影響的，還有留在廣東中山縣（今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他一家老小的生活，而未成年的兩個兒子，亦只有一個能勉強升學了。

我們的主人公楊奇，當時用的還是乳名楊煥祺。在家道中落之時，十一歲的他已顯出了此後伴隨一生的本色：設身處地、關懷他人。他回覆萬般為難的母親：「三哥已讀完初中，再讀三年高中，便可以做工養家了。我還差半年才小學畢業，與其兩兄弟都只是初中生，倒不如讓三哥讀到高中……所以，我去香港陪伴爸爸吧。」

這裏的「三哥」，就是我的父親。後來正是因為叔叔的這個決定，父親得以完成中山一中的高中學業，並以優異成績畢業。父親本可以直接上大學，後因抗日烽火狼煙四起，便毅然投筆從

一支筆和一個世紀

——記我的叔叔楊奇（上）



▲前香港《大公報》社長楊奇，二〇一八年攝於家中。圖為《大公報》社長楊奇，二〇一八年攝於家中。

戎，這是後話。

如果從成人世界的語言來看，叔叔的這個決定幾乎可以被描述為「犧牲」「讓渡」「承擔」。但從孩子的語氣來看，它又非常平靜，沒有任何戲劇性。

更重要的是，它並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一種很清晰的「替別人考慮之後的選擇」。他考慮的不是「自己還能不能繼續讀書」，而是：如果兩個人只能停在初中，那麼是否有一種更合理的安排？

這種思維方式，在一個十一歲的孩子身上，是很少見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後來並沒有消失，而是貫穿了他的一生。無論是對家人、對同事，還是對晚輩，他始終習慣性地將別人放在前面。

他的人生，彷彿不是從「自我實現」開始的，而是從「理解他人處境」開始的。

三

後來慢慢知道，隨著年歲漸長，少時那個習慣替人承擔的少年，在時代的風暴中，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護更多的人。

在叔叔那幾幾乎不主動提起的傳奇歲月裏，凡此種種，其實正應了他名字：一個「奇」字。

那是一九四二年，一個化裝成小學教師的二十歲年輕人，以一份漢奸報紙《南華日報》做掩護，內裹一份游擊隊的《前進報》，隻身穿過日偽崗哨的刺刀，前往香港親友處籌措辦報經費；

那是一九四三年，還是他，把《前進報》編輯室搬入敵偽據點所在的東莞厚街鎮，跟偽軍營房兩巷相鄰，只隔一堵高牆。整整三個月，在牆內油燈下刻字印刷，與高牆外敵人的「潑水吵鬧之聲可聞」，卻毫髮無傷。

在震驚中外的「港九大營救」與秘密護送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動中，他成了那個在多重身份裏悄然潛行的擺渡人。

很多年後，面對記者的提問，他才零星提到過那段日子。在特工盯著、險象環生的香港，他一離開報社，就要先回家換一套衣服。為了扮得像一個「小開」去掩護那些扮成大老闆的北上名

流，他咬著牙，花去了一百二十塊錢——那幾乎是他當時一個月的全部薪水——買了一件英國「燕子牌」乾濕襪。

「換好衣服，看門口沒有人盯梢、跟蹤，我才坐的士出門。離開報社就充作『小老闆』，明天上班又是『報紙佬』了。」他笑著回憶。

在一九四八年的聖誕夜，他把李濟深先生的兩隻皮箱作為自己的行李，在灣仔海旁的六國飯店開了一個小房間，在岸邊風浪如常的黑夜裏退房，把行李搬上小汽船。當一切安排妥當，他給鄧文釗寓所打去一個電話，用極平靜的暗語說：「貨物已經單單買齊了。」

那一夜，他陪著五位「大老闆」走下汽船，駛向維多利亞港深處的貨船。直到清晨，看著貨船通過水師檢查、駛出鯉魚門，他才放下重負，回家蒙頭大睡。

對叔叔來說，這不過是他少時人格結構的延伸：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別人往安全處放。

這種在危急時刻自然先人後己的本能，比任何單一的歷史功績都更具重量。

四

叔叔一生的軌跡，始終與筆、與報紙縫合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晚上，人民解放軍的前鋒已抵廣州市郊。二十七歲的叔叔作為香港《華商報》代總編輯，將一篇《暫別了，親愛的讀者！》終刊詞發下排字房，隨後安排報社同仁在翌晨分散吃了早餐，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分批經惠州坐船，趕往廣州。

迎接他的，是創辦《南方日報》的重任，以及隨之而來的、屬於那個時代的艱難與陣痛。

在那個經濟極度困難的建國初期，為了解決報社的設備與經營難題，他在香港千方百計訂購卷筒紙與斯高脫輪轉印報機。在沒有外匯、紙價下跌的困境中，他四處奔走，借款墊資，終於為報社贏得了生存的空間。

然而，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運動中，這番為了報社利益而進行的紙張經營，卻令他被打成了「大老虎」，甚至一度被錯誤處分。直到幾十年後，這段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

一九五七年，他又參與創辦了《羊城晚報》，在那個沒有人辦過晚報的年代，摸著石頭過河。那份報紙不只有政治的宏大，它更具有市民性、文化性和溫厚的生活氣息。副刊、日常生活、城市閱讀習慣，在其中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可也正因此，在後來的特殊年代裏，它被批判為「集封資修之大成」，叔叔也因此被下放勞動了四年。

大起大落，大風大浪，但他身上的文字風骨與辦報人的性格，從未被打斷。

他不是一個只在政治語言中思考的人。他辦報，是把文字變成連接人的方式。他對日常生活保持興趣，對人與人的關係保持敏感，對文字本身保持尊重。這些東西，最終都流入了報紙，也流入了他的為人方式。